

百年
文学
论丛

Bainian

Wenxue

Luncong

方维保 ◎著

红色意义的生成

——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百年
文学
论丛

Bainian

Wenxue

Luncong

方维保 ◉ 著

红色意义的生成

——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 方维保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2
(百年文学论丛)

ISBN 7-5336-4308-9

I. 红... II. 方... III. 文学研究—中国—20世纪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4208 号

责任编辑：袁 舰 装帧设计：朱 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 1 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晓星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0.625
字 数：260 000
版 次：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1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551)2822632 邮编：230063

出版者言

《百年文学论丛》继《海棠文丛》(一、二辑)、《金蔷薇论丛》之后面世了。这是一套专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丛书。文学在上个世纪是一个显赫的文化艺术门类。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它是文化变革的最重要生力军，新文化运动中，很难想像没有新文学运动；同时文学又是社会变革的武器，参与了血与热的社会斗争。总结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者为之献身的行当，大学设有专门的学科。过去这段文学比照中国古代文学，名之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建国为界划分现当代。时至 80 年代中期有人提出“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整合现当代文学学科，运用整体眼光看待这百年的文学，而不是分段的割裂式的。这一概念已为学术界所接受。这套书原拟以“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为丛书名，但几年前我社已出过这样一套丛书，由严家炎、严云绶两位教授主编的。后改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书”，稍感老化，故改为“百年文学论丛”。运用百年文学的整体视野去研究这段文学，是这套书作者的共同追求，即便在研究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或某个文学现象时也是如此。

百年文学，不止百年；20世纪文学外沿已逾越20世纪的上下限。它的诞生点在19世纪末，它还正在生长蔓延，走入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文学批评在延展，文学研究在深化。我们这套书是这种延展、深化的一部分。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年12月

目 录

一、左翼文学的若干关键词	1
1.“左翼”与“革命”	1
2.“左翼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8
二、左翼文学发生的历史与文化契机	18
1. 历史的理性呈现与文化的智性选择	18
2. 托洛茨基与中国左翼文学	25
3. 左翼与海派之关系	36
三、革命文学的浪漫主义话语原则	43
1. 历史想像中的浪漫期待	43
2. 工农兵形象中心与英雄幻影的缔造	53
3. 政治优位与革命意识形态的繁殖	61
4. 暴力诗学与阳刚风格	74
5. 浪漫原则的演进：话语的规范化	81
四、30年代左翼叙事文学主题的三重变奏	92
1. 革命：现实与想像	94
2. 浪漫：力比多的阴阳脸	105
3. 颓废：道德的与审美的	115
4. 多声部变奏	126

五、革命话语与现代知识主体	131
1. 新文化知识主体的内涵	131
2. 批判意识的消弭	137
3. 话语主体的血统化	154
4. 私人情感的退场	168
5. 后革命时代：知识个性的渐趋回归	181
六、家族伦理与阶级神话	188
1. 红色英雄的成长：从家族英雄到阶级战士	188
2. 被驱逐与被召唤：阶级语境中的传统伦理	196
3. 《三家巷》：革命语境中的继承与变异	202
七、革命话语与性别政治	212
1. 红色尤物：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 与女性身体	212
2. 铁姑娘：体制化革命中“父”的另形	219
3. 《夜》：土地·生殖与革命理性	227
4. 《朗园》：革命·血缘与性别政治	236
八、革命语境中的神话与鬼话	245
1.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化倾向	245
2. 新文学的话语禁忌	249
3. 革命话语对神话与鬼话的祛魅	254
4. 历史化的意义——以名著改编为例	260
九、革命与叙事	267
1. 启蒙叙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267
2. 史诗叙述与集权性话语结构	279
3. 从宗法叙事到阶级文本	290

4. 修改和重写：当代左翼语境中的话语重构	298
5. 传奇：革命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神话	305
十、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事	315
1. 前新时期文学的同构性想像	315
2. 先锋话语的颠覆性虚构	323
参考文献	328
后记	331

一、左翼文学的若干关键词

对 20 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必然涉及文化上的三个维度，一个是革命的概念，革命的理念；二是对于革命理念的讲述；三是革命和这样的讲述在历史形态中的真相。

1.“左翼”与“革命”

左翼，这一词汇在汉语中并不是天然地与中国革命有着姻亲关系。在汉语中，“左”是一个方位词，而“左翼”是指称鸟的左翅膀；后来的引申，是指称军阵的左边一阵；多少带有一点意识形态性质的，则是“闾左”，它主要是指“贫民窟”。但这与现代政治没有多少关联。20 世纪中国文化中的“左翼”，其意义是从西方舶来的，它是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所谓“左翼”、“右翼”是西方议会制度的产物。^①《辞海》对它的起源描述为“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 年 5 月，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与僧侣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其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 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座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座。后来左派、右派即逐

^① 参见《辞源》第 2 册寅部，第 159 页，商务印书馆。左，最初是方位词；刘海波《词汇梳理：左、左翼、左倾》一文对“左”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使用状况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渐成为政党派别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代名词”。瑞蒙德·阿伦(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对“左右翼”的发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他说:“依照李翠(Littre)的观点,所谓‘左派’意指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这个党的席位恰好坐落在总统的左手旁,故称。”^①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在《革命的良心》一书中指出,到19世纪70年代,“左”和“右”的叫法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被普遍采用,但是人们不再限于指议会内部主张议会自由和主张君主独裁之间的区别,随着君主独裁主义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兴起,“左”和“右”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如今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说明人们对社会演变和财富分配的不同态度。(这多少与汉语中的“偏左”之说获得一致。)即一般来说,倾向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是左翼,对立面的则一般是右翼。但是,在左右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为狭义的区别,即不是政治目标的差异,而仅仅是指采用的方法及其热情程度的不同,丹尼尔斯指出:“在某个运动中(不管他在整个光谱中处于什么位置),人们总可以区分出较大胆的或按教条办事的‘左’翼和十分谨慎从事的‘右’翼。”^②这样,关于“左右”之分,人们就有了两种标准,一是政治目标,一是政治手段,而属于左翼的一般是目标或手段上的“激进主义”者,右翼则在目标或手段上采取“保守主义”态度。丹尼尔斯所谓“教条的”左翼当指坚持激进目标者——左翼内部常斥为“左倾教条主义”,而“大胆的”左翼则是手段激进者——左翼内部的“左倾冒险主义”。

然而“激进”是个非常空洞的指称,不具备确定的内涵,天然的

① 瑞蒙德·阿伦(Raymond Aron)著,蔡英文:《知识分子的鸦片》,第3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

② 参见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导言》,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相对性使它的内涵处于不断的滑移状态。什么样的目标算激进的目标,怎样的手段才是激进的手段?这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目标与手段常常并不统一,激进的目标可能采取温和的手段去实现,保守的目标也可以采取激进的手段来维护。因此仅仅用“激进”与否来确定是“左”是“右”,这实在是个漫漶无边的标准。对此,本人的意见是,应当以政治目标为一级标准,划分出左右翼,然后在各自内部,再根据其手段进一步细分出左右;丹尼尔斯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翼就属于手段上的差别。

对于“左翼”内涵的复杂性,阿伦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认为有“三种必然矛盾但通常不合的观念激励着左派:重自由,反专制政权与维护个人权利;重组织,以组织的合理秩序来取代传统或私人企业的混乱;重平等,反对身份和财富的特权”。他认为重组织的左派往往有变成“权威主义”的倾向;而重自由的左派则势必转而反对社会主义,也反对国家主义的左派;而重平等的左派,由于不断反对富豪和权贵,则常常受到各方的批判。^①

上述“左派”、“左翼”内涵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进行历史分析的人都不能不充分注意的。

一般认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左翼”一词是经过日本这个中介而进入中国的,因此虽然“左翼”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汉语里出现了,但却一直被看成日源外来语而收入各种外来语词典。据学者刘海波考证,“左翼”输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1922年,这年8月,《先驱》第10号载有《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宣言》,其中在提到宣言签名者时除了“四百兆被压迫人民的中国代表”,还有“帝国主义的日本的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代表——劳动社代表,日本工会左翼代表,东京、大阪及九州各地印刷

^① 瑞蒙德·阿伦(Raymond Aron):《知识分子的鸦片》,第37页。

工会代表”，还有“在英美荷帝国主义压迫下的荷兰印度各处代表——萨里落伊斯棱会左翼代表”，这次会议于 1922 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①

尽管日本是近代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的一个重要中介，“左翼”一词也完全可能首先出现在日本，但是由于“LEFT”或“LEFT WING”可以直译为“左”、“左翼”，因此也不排除中国人由英、法或俄语直接引进的可能。而且，毫无疑问，“左翼、左派”的概念并不必然与“左翼”一词的输入同步。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所确定的扩大民主联合战线的各项主张中，即提到“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这可谓“左派”概念最符合其发生学意义的应用，即用于议会政治。后来，伴随国民党的改组，“左”、“右”之说开始被频繁用来指称国民党内的不同派别，例如早在 1923 年 7 月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提到：“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需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觉悟的革命分子。”^②

然而“左翼”（不是“左派”）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学概念在汉语语境里的普及主要不是由于政党政治，而是借助了左翼文学运动。据冯雪峰讲述，大约 1929 年 10、11 月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主任的潘汉年找到他，要他找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事宜，冯雪峰回忆：“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自然，鲁

① 《“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② 以上均见《“二大”和“三大”》。

迅完全同意成立这样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同时他说：“‘左翼’两个字还是用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①从这段话看，似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名称是潘汉年的意见，但是笔者认为“左翼”二字是冯雪峰的主意，毕竟早在 1926 年，冯雪峰所译日本升曙梦著《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中就有“新俄文坛的左翼和右翼”一节。这也大概是文学领域使用左右翼之说在中国的开始。伴随“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及其影响的日渐扩大，作为现代政治概念的“左翼”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词汇，尽管它们的古典意义依然使用于军事、体育等领域。^②

在 20 世纪前 10 年的中国革命中，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亲共的“左翼”和反共的“右翼”的分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左翼”一般是指称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同情工农革命的政治活动。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和 30 年代，这个概念在上海被普遍地运用于文化的范畴，指称一些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关或者同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和文化的活动。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左翼”的本质就是“革命”，当然“左翼”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革命”的代名词。

革命，《易》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③陆德明在解释“革”时，引用马融、郑玄的话说：“革，马、郑云：‘改也’。”^④《杂卦传》对此则曰：“革，去故也。”英语 revolution 一词源自拉丁文 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经 14 世纪至 16 世纪之后，“revolution”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 1789 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

① 《雪峰文集》第 4 卷，第 53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5 月版。

② 以上参照了刘海波的《词汇梳理：左、左翼、左倾》一文。

③ 《易·革·彖》。

④ 陆德明：《经典释文》。

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①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的中国挑选了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以暴易暴成了历史新陈代谢的方式。修修补补不可能诞生新时代，摧毁旧世界才会有凤凰涅槃式的新生。余英时认为，近现代史内部存在一个激进主义压倒保守主义的倾向，“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于是，“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② 王元化同时还指出了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③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深入人心之后，阶级斗争成为激进主义选择的表现形式——阶级斗争是埋葬剥削体制的惟一手段。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革命是通过剧烈的社会运动达到历史本质的质的飞跃，是不同历史阶段（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实现转换的手段，通常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而且它常与暴力相联系，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④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革命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革命”具有泛指的特性，如辛亥革命、土地革命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词典中，它其实是“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简称。

正如前述，“左翼”本是一个模糊的比喻性修辞，但它与 20 世

①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 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② 余英时：《中国近代史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 9 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参见王元化《近思札记》，《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90 年代反思录》第 8、第 147—14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④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6—17 页，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时候，“左翼”之“左”和“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就具有了所指的同一性，共同构成了运行于中国近现代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个表象体系，偶尔是概念。但它们是被感知、被接受，被忍受的文化客体，因而它们是通过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过程作用于人。”^①本文所指称的内涵主要限定在一种被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在本文的语境中，左翼就是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当然，这样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仍然具有巨大的差别。

文化史中的“左翼”、“右翼”和“革命”、“反革命”，基本上是一种中性的叙述，但中国现代文化史中的“左翼”和“右翼”以及“革命”和“反革命”却被赋予了道德意义。由于话语的长期被左翼化，因此大多数叙述者都站在了左翼的立场上，这导致了“左翼”和“革命”就成为了正义、进步的象征，成了道德的“善”的化身；相反，“右翼”和“反革命”则是落后、非正义，是道德的“恶”的具体表现。政治意识形态观念与道德评判没有必然的关联，但现在被强行勾连了起来，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认为是不需要论证的真理。于是，在日常生活表象和文学话语中，道德的褒扬和贬斥就追随着政治观念的分别而随时发生，文学话语也就蜕变为一种纯粹的道德话语。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革命特别是左翼革命带有天然的亲和性。左翼政治、革命政治是紧密伴随着新文化先驱的“平民主义”而产生的，是紧密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而发展的，它延伸整个 20 世纪，文学的道德话语也随之延伸了近百年。

① 转引自绿原《20 世纪西方文学理论》。

·2.“左翼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在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一些左翼倾向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得以传播,中国也在这思潮的启发之下而发生革命,“劳工神圣”思想得以确立,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相掺和的左翼思想的社会文化思潮的产生,使知识分子意识在文学和文化中逐渐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自卑意识,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在进行坚定的国民性批判外,开始出现“平民主义”的对农民意识的弘扬倾向。周作人的《平民文学》、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都可看作早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发端之作。胡适的《水调歌头·新俄万岁》、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与《劳动节歌》虽嫌浮泛,却歌颂了新的时代潮流。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记者身份赴苏联,《饿乡纪程》(亦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即为旅苏期间所写的两部散文集(有些篇章曾在《晨报》上发表),作者怀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最早向自己的人民“拨开”国内外反动派所散布的“重障”,真实报道了“俄罗斯红光烛天,赤潮澎湃”的现实以及苏俄“无产阶级创业的艰辛”。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新与旧、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那种复杂、尖锐而曲折的斗争,都在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许多篇章记述了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战胜敌人、排除困难的英勇业绩,表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生机勃发的革命气象。在《列宁》、《赤色十月》等篇中,作者热情地描绘了列宁的形象,显示出人民对党对领袖的无限爱戴和信赖。这一时期对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书写,虽具有信仰的性质,但仍然只是对异域文化状况的“转述”。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学运动开始由新文化运动时代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以蒋光慈、成仿吾等左翼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作家、理论家开始着手批判传统写实主义——“五

“四新文学”，而提倡类似于苏联唯物辩证法创作的“新写实主义”，革命书写信仰开始了它的本土化历程。

革命现实主义在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的中国文学中，最初被称为“革命文学”（后来也一直这么称呼）。1922 年 1 月，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开辟“革命文学”专栏，发表富有“革命”精神的诗作。1923 年 3 月，中共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新宣言》中提出，中国的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之指导，不能成就”。1923 年 5 月 27 日，郭沫若在《创造周报》第 3 期上发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提出：“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在同一期上，郁达夫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说“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结成一个世界共同的阶级，百屈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确信‘未来是我们的所有’”。同年 12 月 22 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主张以文学为工具，新诗人要从事于革命的实际活动，做革命的诗歌。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1924 年 5 月 17 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 31 期上，再发表了《文学与革命（通讯）》，正式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激励一般文学青年能够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于革命事业，培养革命的感情，创作出“革命文学”来。1924 年 8 月《新青年季刊》第 3 期发表了从俄罗斯留学归来不久的蒋侠僧（光慈）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与革命》，他介绍了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文化的论争，并指出：“无产阶级既成为政治上的一大势力，在文化上不得不趋向于创造自己特殊的（文化），而与资产阶级相对抗。”1924 年 11 月 6 日，沈泽民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更明确地提出了时代对于革命文学的需要。他呼吁：“起来，为了民众的缘故，为了文艺的缘故，走到无产阶级里面去！”1926